

#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

龙 泉 明

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这即是说,人类(包括个人)应该而且必然具有这种“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忏悔意识,因为它是“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的体现。对于忏悔意识的理解,学术界有种种,但我认为,忏悔意识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现实在人的主体心灵所产生的一种内省和反思,查问和审视。一般来说,它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指用自己已有的价值观念和尺度反省自己在现实中的行为和心态;另一种则是指能够站在超越于现实利益考虑的更深层次上,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对民族与自我进行历史的反省。鉴于二者着眼点的区别,我们把前者称为“现实反省”,把后者称为“历史反省”。不同文化性质的民族,其忏悔意识则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对于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西方民族来说,更侧重于历史反省的方式,他们对于以往铸成的错误或罪恶的深刻认识,常常带有强烈的情绪因素,伴随着感情上的痛苦和灵魂的内在折磨。对于实用理性特强的中国民族,一直把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视为美德。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内圣”是对个人内心修养而言,“外王”是对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由于重视“内圣”,因而靠理性来调节自身行为,平衡内心情绪,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思维定势。“五四”以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渗入,中国现代作家有了一种能够超越现实价值的历史眼光,“历史反省”意识比传统的“现实反省”意识来得更加清醒和有力,给中国新文学注进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在1916年岁末除旧布新之际,陈独秀号召青年首先不是去清除别人身上的罪恶,而是“从头忏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这就是说,罪孽不是异己性力量外加的,而是深植于民族母体自身的内部<sup>①</sup>。李大钊指出:“我们对于忏悔的人十分可敬,我们觉得忏悔的文字,十分沉痛,严肃,有光华,有声响,实在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福音。”<sup>②</sup>闻一多则说:“人不怕有罪恶,只怕有罪恶而甘于罪恶,那便终沉沦于死亡之渊里了。人类的价值在能忏悔,能革新。世界的文化也不过由一点发生的。忏悔是美德中最美的,他是一切的光明的源头,他是尺蠖的灵魂渴求展伸的表象。”<sup>③</sup>鲁迅也指出反省是前进的希望的标志:“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而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sup>④</sup>这种忏悔意识显然是与西方忏悔意识相联系的,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最根本的觉醒。

于是,一种从近代开始萌发的对自身存在状态进行严肃的历史反省的忏悔意识,到“五四”时期,推进到了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反省和批判的深度上。一批思想先驱在探索中国落后之因的过程中,不期然地将思维聚集在国民人格的病态上。梁启超认为,中国所以贫弱不振,是因为中国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素质太差。胡适探究救国之途的结论是:“现在中国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这种历史反省的理性自觉,最集中最鲜明地反映在

“民族魂”鲁迅身上，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sup>⑤</sup>，在勃兴的现代西方文化和衰败的中国社会现实两面反差极大的镜子的映照下，鲁迅较同时代任何人都更深刻地认清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特征，更清醒更理智更彻底地进行了民族内部的反省，这主要体现在对阻碍中国现代文化改革的封建文化和国民性格作根本的否定和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来”<sup>⑥</sup>。于是，我们看到，鲁迅的揭露可谓震聋发聩：

“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坟·灯下漫笔》）；

中国的固有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老调子已经唱完》）；

中国的封建道德是虚伪的“二重道德”，伪善，装腔，带着假面具做戏，“前台的架子，总与后台的不同”（《马上支日记》）；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滋长了“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在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思“振拔改进”，却以国粹夸示于人（《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中国人“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坟·灯下漫笔》）。

鲁迅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反省，具有空前的尖锐性与深刻性，它使“五四”新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跃上了新的高度。他的第一声“呐喊”对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揭示与反省，对“阿Q精神”的典型概括、针砭与反思，可谓惊世骇俗！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国民人格的病态的考察与反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立人”——促成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人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说，鲁迅力求通过民族的自省来唤醒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加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从而“立国”——使中华民族不被“世界人”挤出，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鲁迅同时代的一批作家，也不约而同地展开反省传统的思路，也无不循着一定的轨迹围绕着树立大写的“中国人”这个中心而运行。例如郭沫若的诗，田汉的剧，郁达夫的小说，成仿吾的评论等，以不同凡响的音色组合成一股讲究真诚、刻意“暴露”的声势浩大的最新异的创作思潮。他们以震惊世俗的“真率”，无情地嘲弄了那种表面温文儒雅实则腐臭难闻的旧的道德价值观。他们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背甲里面的封建道德的虚伪，对人的自然性能和丑恶的内心世界，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和反叛。如果说鲁迅的历史反省着重揭示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极端残酷性，那么创造社作家的历史反省则集中批判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极端虚伪性，二者都对封建传统道德观的本质作出了最深刻的反思。他们这种历史反省带来了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世界意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最痛苦的灵魂”。他们同民族一起受苦，并且替麻木到感受不出痛苦的灵魂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们最早表现出对人的自身价值的特别关注，真心实意地描写了人也批判了人，以嘹亮的呐喊冲破了中国人在自我认识上的朦胧状态，使人们看到了自己的面貌与灵魂。可以说，是他们真正开启了现代中华民族的自我认识史。

与此同时，作为具有沉重而严肃的危机感和使命感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就不能不在审视时代与民族的同时，也审视自己，解剖自己。鲁迅既是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敢于拷问时代的、“撕破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敢于给自己和人类施加“精神的苦刑”的“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在从人性、人道与伦理道德的忏悔中展开对整个民族的认识面前，又以其真诚与良知和民族一起忏悔，从忏悔中反省自身。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sup>⑦</sup>“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我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sup>⑧</sup>。不把解剖别人（民族）与解剖自己割裂开来，而是在

解剖别人(民族)时也解剖自己。在鲁迅的第一声“呐喊”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妹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

这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自审”!他以“真的人”是“没有吃过人的人”和“我是吃过人的人”这两个基本判断为前提进行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他在对传统的历史否定中,发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否定传统,首先要否定自我;否定现存制度的“尽善尽美”,首先要否定自我的“尽善尽美”。于是,自我身上的崇高感丧失了,英雄主义光圈开始失色,于是终于懂得:自己并不能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与主人,因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当然容不得“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存在。鲁迅对于“吃人”现象所感到的深切痛心和对自身恶行的深刻忏悔,深深地烙上了现代意识的印记<sup>⑨</sup>。他的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已不单是个叙述视角的问题,实际上,“我”已成为作品中的一个主要人物,鲁迅的自审正是通过对“我”的心灵解剖来完成的,作品所描绘的正是“我”的忏悔心理和情感的历程。鲁迅敢于探索自身的“鬼气”,甚至为全民族的“恶行”而自责,表现了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巨大勇气。正是勇于站在现代意识的制高点上,对自身进行自觉的、清醒的、深刻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解剖和否定,才使鲁迅创造出了真正显示知识分子本相的、有深度、有力度的艺术形象来。

最早开始了灵魂蜕变的还有郭沫若,他称自己为“罪恶的精髓”。他在写作《凤凰涅槃》前三天,曾在给宗白华的信中忏悔道:“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佩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 phoenix 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三叶集》)。他还说过:“我常恨我莫有 Augustine、卢梭、托尔斯泰的天才,我不能取出那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罪恶的负担,若不早泄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论诗三札》)他这种否定旧我的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在《女神》中明显地化为这样的意象:在烧毁旧世界的同时把旧我一起烧掉;“凤凰”集香木举火自焚,包含着对旧我的否定;“天狗”在突入宇宙,获得无穷能量的同时,又自噬其身,自我进一步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因此闻一多曾高度称道郭沫若《女神》以“不怕有罪恶”、“能忏悔,能革新”的自我解剖精神,“喊出了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田汉也称《女神》首首都是诗人的“血”和“泪”,不愧为伟大的“自叙传”和“忏悔录”。郁达夫的忏悔也有着时代和个人的真诚。这主要渗透了卢梭的影响——那种对性的追求和肉的放纵所作的赤裸裸的自我告白,那种对情感和个性的热烈肯定与歌颂,那种在情感和心理矛盾中所作的自我表现的坦诚和忏悔的大胆真率,不仅叫所有伪君子自惭形秽,就是与那些超凡入俗,绝灭俗念,庄严肃穆、宁静不扰,精神绝对统一,毫无半点瑕疵的完美者相比,他也显得更为可爱和特别有力。他在性的追求中时常伴随着一种难以解脱的犯罪感与忏悔感,痛苦不断地折磨他,使他内心得不到安宁,这正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和自审。

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五四”文化先驱们在历史反省意识中充分体现了20世纪时代精神的根本——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从而在政治层次上达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高度。在当时热衷于伟大的思想启蒙工作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林语堂以及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闻一多等都多少有着历史反省的观照方法和自由意识。在创作上,则有老舍、沈从文、茅盾、曹禺、巴金、张天翼、艾芜、沙汀、肖红、丁玲、赵树理、路翎等作家对鲁迅所开拓的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他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着整个国民

性的改造，力图刻划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正如张天翼在《论〈阿Q正传〉》中说：“自从你这个阿Q被创造出来之后，我们民族许多有良心的艺术家，都是怀着极大热情，在不断做这些洗涤灵魂的工作。”无疑，他们是把自己的创作看作为“洗涤灵魂”的工作，他们以无法排解的忏悔和忧思，产生了一批足以跨进中国现代反封建文学队伍的优秀作品，如《鬼土日记》（张天翼）、《骆驼祥子》（老舍）、《寒夜》（巴金）、《北京人》（曹禺）、《财主底儿女们》（路翎）、《呼兰河传》（肖红）、《果园城记》（师陀）、《围城记》（钱钟书）、《金锁记》（沙汀）、《腐蚀》（茅盾）等，他们以其历史的透视力与社会的穿凿力表现了重铸民族灵魂的意愿和主题。在那抗战烽火和人民解放战争风暴面前，有的作家把政治反思与文化反思融合在一起，由此达到历史反省的境界。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就是一部从文化的视角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作品，贯穿着鲜明的民族自审意识，“作家同小说中许多人物一道，从政治文化救亡的高度上反省过去，与民族共忏悔，共忧思，而文化性反思的结果，笔触不仅深入到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且浓墨重彩地勾画出战火中国人文化心理的震动和变化，表现出新时代振奋的民族精神。”<sup>⑩</sup>但是，在“救亡”任务紧迫的三四十时代，这种具有思想启蒙性质的历史反省并没有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潮，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

具有强烈现世功利感和重视社会整体的和谐的现代作家，不可能以更多的超越性去作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历史忏悔，而是以一种沉静冷峻的客观态度和现实价值尺度，反省和反思自身的文化方式，审视剖析自己的心态和行为，甄别其中的真价值和假价值，真善美与假恶丑，以获得与时代同步、与群体和谐的归属感。因此，随着“五四”兴起的历史反省意识的逐渐弱化，而从“五四”就与历史反省意识并存的现实反省意识则逐渐强化，并成为现代作家在三四十年代的主要忏悔方式。

现实反省能够改变那种传统中国人“喜责怪环境和条件，却不肯思考为什么自身缺乏改变环境条件的力量；爱抱怨命运，却不相信命运就是性格；爱寄希望于来世，靠苍天救星的拯救，却不相信自己应该承担起自身前途的责任的宿命观和思想惰性力”<sup>⑪</sup>，使人获得积极进取的内在动力。现代作家为了保持进取的方向和力量，常常从外在的行为转向内在的“自省”，时代的发展变化促使他们对原先的思想意识作自觉的扬弃。正如荣格所说：一个人“只有当他适应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当他同自己保持和谐的时候，他才能以一种理想的方式适应外部世界所提出的需要；同样，也只有当他适应了环境的需要，他才能够适应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达到一种内心的和谐。”<sup>⑫</sup>现代作家退缩到内心深处作现实反省，正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获得外在行动的新的能量，达到身心和谐和思想与行动的统一。其现实反省的内容，主要是立于伦理政治情感意识和文学艺术审美观念层面的现实审视。如“新我”与“旧我”、“大我”与“小我”、进步与落后、变革与保守，崇高与卑微等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靠理性的支配在二者之间作出真与假的判断，肯定与否定的选择。鲁迅从一件在一般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件小事》）中，却看出了它的深刻内蕴，进行了深沉的反省，毫不留情地作出了自我解剖，并从劳动人民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获得了“催我自新”的“勇气和希望”。这种“敢于明言”、“不留情面”的“自我解剖”在《父亲的病》、《风筝》、《藤野先生》、《关于杨君袭采事件的辩》等篇里，也都表现了出来。并且鲁迅小说笔下人物的内心反省，有时也是鲁迅自己的内心反省。他的《野草》把同代人对人生真谛的探索，消融在他的自我探索之中，在苦闷与忧郁中洁身自好，在清醒和孤独中拷问自己的灵魂，以致引起心灵的强烈震颤。鲁迅人格的伟大，正表现在他从不宽恕、从不原谅自己的缺点与过失；也在于他总是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获得进取的力量。郁达夫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也是以反省自我

的方式表现的自我再塑意识。他和鲁迅的作品在后来的评论界得到一致的肯定。张天翼“五四”时期写了《新诗》《流星》几篇“得意之作”攻击新文化运动，认为新小说是“无聊、瞎扯”。当《阿Q正传》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冲决这位“卫道者”的防堤的时候，他却想维护“自尊心”的“面子”。后来他忏悔了：“自己原来是‘未庄文化’的受害者”，“灵魂里也有阿Q的灵魂的原子”<sup>⑬</sup>，承认自身的阿Q性，撕毁所谓“自尊心”的面子，这无疑是张天翼最深刻的自我觉醒和最严厉的自我批判。这种觉醒和批判对于他的艺术创作是十分重要的，唯其不“自欺”，才能不“欺人”，唯有扯得下自己的“面子”，才能有力地戳破病态社会的“面子”。

“五四”时期，现代作家投身于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自觉进行历史反省的同时，也不忘现实的自我反省。这是因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巨大的政治热情驱使着他们投身改造社会的政治活动，但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的屡遭失败以及暴露出来的无能为力和思想弱点，又使他们不断地沉湎于自我的忏悔之中。到了三四十年代，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深入，则要求作家走出亭子间，投身现实斗争，战胜自身的精神弱点，向工农大众靠拢。这样，现代作家的自我重新估计和自我改造便迫在眉睫。延安文艺整风更把这种时代的内在要求明朗化、强烈化了。《讲话》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一定要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严峻问题。在那时，社会普遍认为，知识分子只有站到工农兵一边才有价值，只有改造自己和接受改造才能使人生获得意义。“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被时代提到了真理性的最高度，从而使作家们在这种理论前提下形成了自觉的忏悔心理。进入革命队伍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自觉地或不得不如此地进行着自我改造、自我反省和自我再塑，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标尺来检验自己的思想立场、行为方式，反省个人感情与工农兵感情的格格不入，忏悔自我个人意识与阶级团体意识的矛盾冲突。如柳青为了寻找忏悔的个人前提，甚至不惜抬高自己的出身成分，以便和贫民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又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名利主义概括以往的革命行为，在自我否定中完成忏悔历程，达到心理平衡<sup>⑭</sup>。经过一段“脱胎换骨”的痛苦历程后，时代要求就内在地化为他的内心愿望了。闻一多后期写下的杂文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心灵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忏悔录。他彻底地清算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他真诚地自责：“我们昨天的那种严守中立、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不是受人欺骗，便是自欺欺人……因为只有我们超然，老爷们才更敢放手干他们那套卑鄙的吃人勾当。”<sup>⑮</sup>当他看到人民的力量，就反复强调“假如我们是和人民在一起，我们就有希望了”。这种“觉今是而昨非”的心灵剖白，在何其芳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深刻，颇具现身说法的教育意义。

在何其芳的著作中，“诚实的表白，公正的内省”<sup>⑯</sup>，力透纸背。他常常用新的价值标准来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他在1944年的《〈夜歌〉初版后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面的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里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而且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反复地说着那些伤感、脆弱、空想的话呵。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那样缠绵悱恻，一唱三叹呵。现在自己读来不但不大同情，而且感到有些厌烦与可羞了。”

如此严厉、真诚的自审文字，在他不少文章中都可以见到。他说：“我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而又是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夜歌》）从他的诗中，的确可以看到“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我们从他的抒情主人公剧烈的自我冲突、孤苦的告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也仿佛是在地狱与净界的交叉口上挣扎，他冲出

了密密的众恶之窟，用含泪的夜歌洗涤着自己带血的创口，在既定的路上，艰难地迎接着重生的曙光。

在那时，现代作家普遍存在的“思过疗伤”的现实反省大都是严肃认真的自我解剖。他们面对无可挽回的缺点错误进行深刻反思，必然伴随着感情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折磨，许多矛盾重重的思考，种种不同情绪的持续斗争，使他们在治丝愈纷的状态下寻找矛盾解决的方式，渴求灵魂的归宿。从这种“思想交锋”、“灵魂搏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挣扎着的良知，一种挣扎着的灵魂。柳青、闻一多、何其芳等的忏悔历程正是三四十年代从“象牙之塔”走到“宝塔山下”、从小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的广大作家的心灵历史的写照！

在那个时代，以政治的动向为标尺的品质显得十分突出。现代作家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患，心悦诚服地接受时代政治的牵制。不断增强的政治责任心时时压过对形而上问题（包括历史反省）的关注，迫使他们把思想改造的任务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把对自己的负责视为对政治的负责，对革命的负责。自审的思辨理性服从于政治实用理性。独立思考的品格、真诚的灵魂拷打与外在的政治需求联在一起，使他们常有心不由己的心理失衡，这在当时他们是不可能自觉认识到的。

随着现代作家这种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强化，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奏，人物形象塑造也发生了相应的倾斜。在初期革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革命者后，常常是以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形象出现，如《咆哮了的土地》中领导农民奔向金刚山的李杰，《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里组织工人游行罢工的望微，这些知识革命者有时也不免对自身的弱点有所谴责，然而主要是自剖和自审的方式，作品着重点也不在这儿，更重要的是突出了他们领导组织革命的业绩。30年代以后，作品里出现了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审判，原来的知识者领导形象都逐渐地落入了被动的位置，成为被改造和接受被改造的形象。并且成为革命者的知识者，再也没有成为文学中的真正主人。这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40年代文坛有正直的书呆子气的科学家形象（如《法西斯细菌》中的俞实夫，《岁寒图》中的黎竹荪、《万世师表》中的林桐），而没有清醒的、感情丰富的、具有深刻的历史眼光和强大的实践能力的知识分子形象。丁玲《在医院中》塑造了一个一般的正直的知识者，也遭到了非议。40年代作家主要是沿着两个方向（肯定与否定）一个原则（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来描写知识分子形象：一是歌颂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斗争实践，克服自身弱点，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直接表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二是嘲笑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动摇、软弱、无能，间接展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作品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作家自己内省灵魂的表现。作家的自我解剖和反省溶入审美创造活动中，就自然形成了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批评对象和讽刺对象的审美选择。与此同时，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大都以政治革命形式为“模拟物”，以创造和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中心任务，一些作品在描写工农兵形象时，出现了不惜拔高和纯化的现象，只是它们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罢了。总之，这时期文学烙下了“现实反省”的沉重印记，为我们审视整个时代的政治思潮和文学思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也为我们探索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冲突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作家丰富多样的意识构成中，忏悔意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忏悔意识虽然在各个作家那里表现出纷纭复杂的状况，但从整体和宏观考察，大都经过了由历史反省到现实反省的大转换，这种转换也正是作家与时代在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上互动与共振的经果。历史反省与现实反省作为现代作家忏悔意识的两种基本形式，在实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说历史反省着眼于整体的人，历史的人，那么现实反省则着眼于具体的人，

现实的人；如果说历史反省着眼于民族精神的重建，人的素质的提高，那么现实反省则着眼于某种人的模式建构，和某种人的类型化再塑；如果说历史反省注重的是历史价值，那么现实反省注重的则是现实功利。并且，历史反省在反省过去时，也瞩目现在，在考察现在时，也回眸过去，有一种深厚的历史视野；现实反省则始终关注于当前，以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反省自身，缺乏一种深厚的历史眼光。二者由于着眼点的不同而显出极大的差异和优劣。历史反省在“五四”作家那里表现出了强大的思想力量和历史批判精神，对思想启蒙运动的推动和中国新文学的建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反省意识在以后的被削弱和被忽视，不但影响了现代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批判锋芒，也给文学留下了历史的遗憾。现代作家在三四十年代普遍转向现实反省，使他们从政治选择上适应了历史的更求，对他们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政治选择尽管事实上为文学带来了新的活力、新的面貌，但同时文学也支付了相当大的代价。把文学作为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这种偏至和倾斜，在那个特殊时期是合理的，但后来把这种局部的合理性夸大为普遍合理化，把不得不偏至的现象上升为永恒的准则，那就造成了文学不应有的损失和作家精神折磨的痛苦。许多现代作家接受被改造的虔诚和竭力反省的自虐的心态的膨胀和畸变，发展到以后就是无条件地接受被批判和无休止地自我批判，由此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丧失知识分子的价值地位，导致他们自主意识的退化，创造主体性的失落。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作家在解放前创作甚丰，成就颇大，而解放后则创作大滑坡，甚至几无成就。有的干脆搁笔了，有的则转向其它领域去实现个人的价值。现代作家这种心态的蜕变，难道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么？

注释：

- ① 转引自刘再复《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命运》。
- ② 李大钊：《忏悔的人》，《新生活》第22期，1920年1月8日。
- ③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
- ④ 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 ⑤ 鲁迅：《华盖集·通讯》。
- ⑥ 参考陈学超《论鲁迅的文化选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4期）、李继凯《建构“立人”的系统机制》（《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2期）。
- ⑦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 ⑧ 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 ⑨ 参考钱理群《鲁迅心态研究》，《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
- ⑩ 黄曼君：《民族新文学性格的重塑和再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 ⑪ 转引自何新《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
- ⑫ 《荣格文集》第8卷第39页。
- ⑬ 张天翼：《“二十一个”及其他题记》。
- ⑭ 参考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 ⑮ 闻一多：《民盟的性质与作风》，1946年6月28日。
- ⑯ 刘西渭：《谈〈画梦录〉》。